

当代江苏学人丛书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编



雪后红梅

——哲学家孙叔平

李 沙 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江苏学人丛书》序一

● 季 美 林^①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决定出版一套丛书，定名为《当代江苏学人丛书》，蒙朱步楼同志垂青，征序于我。这个光荣任务，我本来是不能，不敢，也不应该承担的。因为，除了对初入选的数十位著名学者，不管是已故还是健在，怀有很诚挚的崇敬之心外，我同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界联系不多，情况不明，焉敢斗胆乱加评述，乱发议论呢？那样做岂不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吗？然而，继而一想，最近几年来我对目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处境比较担忧，宛如骨鲠在喉；现在有了这样良好的机会，何不一吐为快呢？于是，我就应允了下来，写了这样一篇序。

^①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

首先我想对本丛书中“当代江苏学人”作一个明晰的界定。因为，一般人一看到这个名称，就会毫不犹豫地认为是“出生在江苏的著名学者”。一般的用法确实如此。然而我细绎这数十位学者的籍贯，却发现出生于江苏省少而生于外地者多。这一点关系并不重要，因为江苏素称文化之邦，历史上著名学者灿如列星，用不着外地学者来增光添彩，自有其辉煌处，然而，现在既然把外地学者列入，就说明，这里的“江苏学人”是指在江苏工作的著名学者。这一点还是说清楚了好，免得产生误会。

2 现在来谈关于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处境的问题。最近几年来，我同许多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朋友们一样，深感我们处境的不能尽如人意，直白地说，就是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对于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来说，这是很不利的。建设国家，没有科技是绝对不行的；但是，只重理工而忽视文科就能行得通吗？从近代世界历史上来看，日本是现代化比较早的一个国家。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确实全力学习西方的科技，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忽视文科。西方的政治和法律等方面的学问，他们也兼收并蓄，同时又努力发扬本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到了今天，日本终于成了举足轻重的世界科技大国。这一段历史经验是值得记取的。

专就中国而论，我们不是经常说：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吗？这个“特色”怎样表现出来呢？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我只读过其中的少数几篇。我觉

得,或者我幻想,在科技上表现特色是异常难的。即使你达到世界最高水平,同别的国家比起来,也只是量的差别,很难说有什么“特色”。特色只能表现在中国悠久丰厚的文化积淀上发展起来的科技上。只有这样的科技才能在世界科技坛上别开生面,独放异彩,为人类科技的发展另辟一条阳关大道。而要想做到这一步,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同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携手共进,互助互补。我们现在提倡文理交融,我认为这是下一世纪中国教育和科研发展的必由之路。

就是根据我上面这一点肤浅幼稚的认识,我觉得,我们举国上下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都应该有足够的认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奋发努力,中国的未来是大有希望的。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对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以及其他有关院校和科研机构过去所作出的成绩,表示最高的敬意和感谢,对你们今后的工作,寄予最深切的希望。

骨鲠吐尽,序言打住。切望专家学者们不吝赐教。

1999 年 6 月 18 日

《当代江苏学人丛书》序二

● 朱步楼^①

5

江苏，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素称人文荟萃之地，学界群星璀璨。在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史上，曾经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学者：范仲淹、王安石、王阳明、王艮、冯梦龙、金圣叹、李贽、顾炎武、钱大昕、魏源、王韬、薛福成、马建忠、柳亚子、王国维……正是他们，为江苏，为中国，也为世界，树起了一座座巍峨耸立的学术丰碑，汇聚了蔚为大观的精神文化遗产。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江苏的学者们依然凭其不屈的人文精神，孜孜矻矻，勉力奋耕，进一步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高质量的学术成果。面对这些弥足珍贵的学人和思想资源、学术和文化精华，作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我们

^① 作者系江苏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有理由也有责任尽其心力,梓行之,传播之,倡扬之,发展之。

21 世纪,是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世纪,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世纪。要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新世纪创造新的辉煌,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而要在知识经济时代开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新局面,决不能只靠星星点点几束火把的照耀,应该有庞大的学者群体来点燃科学的火炬,应该有无数有生力量给予的智力支持,同时,还应该实现文化薪火一代一代的不断传承。正因为如此,我们就要不断总结前贤的经验,学习前贤的榜样。

《当代江苏学人丛书》作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重点工程项目,计划用几年时间,出版 50~100 部。该丛书以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当代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界的著名学者为收录对象,较全面、多角度地反映他们的家世生平、治学经历、学术成就、道德修养和生活情趣。这套丛书,不仅是江苏文化大省建设成果的展示,也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科学知识普及和科学精神宣传的读物。

学术研究意味着艰辛的探索。应该指出,学术并不仅仅指向清贫,学术有时也会带来诱人的财富、掌声、鲜花和荣誉。但是,任何踏进学术研究领域的人,都应该做好甘于清贫、耐得寂寞、愿意为学术而长期坐冷板凳的思想准备。80 多年前,20 世纪科学界的伟大泰斗爱因斯坦在庆祝他的老师、著名德国物理学家 M·普朗

克 60 诞辰的宴会上,说过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他说,科学的殿堂里熙熙攘攘,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其中有些人是为了追逐荣誉地位而来的,有些人是为了寻找金钱财富而来的。有一天,天使降临人间,决定对科学殿堂进行清理,结果他发现,在把上面所提到的两种人赶走以后,科学的殿堂里还剩下了一些人,这些人是为了揭示科学的奥秘而步入这一殿堂的。爱因斯坦认为普朗克就属于那些为数不多的、仍然留在科学殿堂里的人之一。在《当代江苏学人丛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当代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界的著名学者,为了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一腔赤诚,执着追求,锲而不舍,咬得菜根香,甘坐冷板凳,无怨无悔,其人物风采、献身精神、治学之道以及所精心营造的缤纷璀璨、洋洋大观的学术天地,充分体现了他们优秀的人文精神和学术品质。这些,无疑是后辈乃至全社会所需要深深汲取并发扬光大的宝贵财富。

目前,我们的国家仍不富裕,中国的现代化有待于我们不懈地艰苦奋斗。我们还远不能说我们已经向学者们提供了充裕的物质条件和研究环境。因此,一方面,我们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努力形成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符合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人才成长规律的科研体制和运行机制,面向社会和市场的社科成果转化机制;另一方面,政府要继续增加投入,积极改善学者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对于确有贡献者,要给予重奖;同时,我们还应该

积极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学者们的合法权益。但是我想强调说明,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是他们治学的必要条件,而不是根本的条件。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是像爱因斯坦所说的,他的老师普朗克那样的人,即一个以追求科学真理本身为幸福的人,一个甘于寂寞、乐于奉献的人。在我们面前,这样的例子有很多:顾炎武为了追求学术自由而甘愿终老于穷乡僻壤,孙冶方为了捍卫真理而甘冒被打成“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的风险……与他们相比较,清贫的生活、简陋的物质条件、长期的默默无闻,更加算不了什么。然而,往往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容易养成真正的伟大的学者的品格。他们不是为了品尝艰辛,也不是为了追求享乐而来到世界上的,而是为了品尝寻找科学真理的果实的快乐来到世界上的。这样的科学家,才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队伍的主体。

梁任公有言:“学术者,天下之公器。”我深信,以人物风采、学术品位为指归的《当代江苏学人丛书》,一定能够跨越时空,传诸久远,并嘉惠学林,裨益后世。

编者前言

孙叔平先生，原名颢孙叔陶，安徽萧县人，1905 年出生，1949 年起一直在江苏南京，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83 年因病去世，享年 78 岁。

9

孙叔平先生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建国后，他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顾问、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顾问、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国无神论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江苏省哲学学会会长、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南大党委书记、副校长、哲学系主任、教授、博导。

孙叔平年轻时，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满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投笔从戎，拿起武器打击敌人。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他又走上抗大的讲台，向指战员和投身革命的知识青年宣讲革命道理，传播马克思主义真谛。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大众化和通俗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但是,最能体现孙叔平先生崇高历史地位的,是他的《中国哲学史稿》的问世。这是建国后第一部以个人名义撰写出版的哲学史巨著,是他晚年在极其艰苦和危险的环境里,致力于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一个历经数次政治运动磨难,身心疲惫的花甲老人,在政治环境极其恶劣、学术风气荡然无存的“文革”期间,冒着再次被批斗、被抄家的危险,和命运作了无比顽强的抗争,他的勇气令与他同时代的人感叹不已,也使今天的后学之辈对他肃然起敬。人们不禁要问,在这位老人充满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是什么支撑着他的不屈信念?为什么在他生前,有那么多人热爱他、尊敬他,在他去世后,又有那么多人哀悼他、怀念他,为他的不幸辞世而扼腕乃至失声?

有人说,是因为他坚持不赶浪头,不出风头,不做墙头草,更没有随波逐流,表现出一个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知识分子的伟大人格。也有人说,是因为他擅长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表达深奥的哲理,他的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又逻辑严谨,言简意赅,文字优美,具有民族化、大众化的文风,使他的听众和读者们赞叹不已,没齿难忘。又有人说,是因为他以一颗真诚的心对待他人,对同志他平等相待,热情帮助,朋友引他为知音,下级庆幸自己遇上了好领导;对学生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学生视他为良师,为益友,为他极大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还有人说,是因为他自甘寂寞,多年来潜心从事学术研究,不图虚名,踏踏实实作学问,与时下普遍的“学术浮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编者在这里无意宣称哪一种说法最有道理。相信读者在读完这本小书后,自己会得出恰当的结论。如果您在最后掩卷时,确实感到有所收获,有所启迪,我们也就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单 沙

1999 年 10 月

当代江苏学人丛书



岁月篇

雪后红梅——哲学家孙叔平

战争年代

● 程广庆^①

孙叔平,安徽省萧县人。生于 1905 年 10 月 21 日,1983 年 12 月 24 日逝世,享年七十八岁。他七岁上了私塾,在多年的学习中,他熟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勤学中国古典诗词和名人传作,早年就能写出简洁流畅的文章,注重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幼年时代打下的这种功底,对于他后来的事业是必不可少的。

此时正值辛亥革命发生,1911 年在孙中山领导下,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但是,封建复辟势力仍很顽强,社会变化甚微。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波及全国,这时私塾被关闭了,孙叔平进了本乡的高等小学读书。

^① 作者原系南京军区政治部副军职教员。

在新的学堂里,他学到了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知识,清除了许多陈旧观念,开始憧憬自己的未来。1921年,孙叔平高小毕业,考入江苏第二中学(即今苏州中学),被编到理科班就学。那时,他埋头勤奋读书,把“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

1923年,孙叔平初中毕业。因家道衰落而休学,回乡当了一年小学教师。这一年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他接触了当时的一些革命工作者,他们给他讲了中国的现实和出路,讲了许多救国救民的道理,指出政治问题不解决,“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都是空话。他又目睹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地方豪绅的横行,激起了他对社会的不满,产生了愤世嫉俗的思想。

1924年,孙叔平又回到江苏第二中学高中部读书。当时正是中国大革命的初期。一首“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在中国大地上流传。这时的孙叔平,已不安心于在学校作化学、物理实验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梦想破灭了。他不再有兴趣埋头于数理化学习,而转向文学,想用文学来唤醒民众,挽救中国。

同年9月,爆发了“江淞战争”。直系军阀孙传芳和皖系军阀卢永祥部队在嘉定、太仓地区对阵,兵荒马乱,战火纷飞。他面对这样的现实,虽还在读书,但国家的命运如何,个人的前途如何?不能不进行思考。“中国往何处去?”成为孙叔平经常思索的重要问题。有许多可供选择的道路摆在他面前。此时代表不同思潮的刊物和书籍,如国家主义派的《醒狮》,国民党的《觉悟》,共产党的《向导》,共青团的《中国青年》,成了他日常不可缺少的读物。他慎沉地思考着,对照现实,进行比较。最后终于选择了拥护国共合作,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的道路。

1926年,孙叔平高中尚未毕业,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昌大学(今武汉大学)外语系。此时,国民革命军已开始北伐。5月,先头部队出兵湖南。7月,北伐军胜利进入长沙,吴佩孚部节节败

退。8月,北伐军占领岳州,随后进入湖北。吴佩孚调集主力,拼死抵抗,双方经过异常激烈的战斗,北伐军终于击溃了吴佩孚的主力,直逼武汉。9月,分别占领汉阳和汉口。10月,北伐军取得了攻克武昌的胜利,武汉解放了。这一胜利的革命形势使孙叔平很受鼓舞,点燃了他心中的希望,以为中国从此将走向光明,他可以在大学里安心读书,学习外国文学了。学校在寒假里登了开学广告。年底,他不顾长江下游尚在孙传芳控制下的危险,只身前往武汉。到达武汉后,他被大革命的浪潮所激励,积极投入到学生自发组织的革命活动中去。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时,孙叔平阅读了郭沫若等的《请看今日的蒋介石》一文,给他指明了方向。他仍然坚信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的革命必须进行下去,否则中国是没有出路的。他拥护武汉的国共合作,渴望能够重新出现一个好的革命局面。他和许多同学一起,天天上街宣传革命。在学校,一有空他就抓紧时间阅读英文小说、诗歌,学习自己的专业。不过,在这种动荡多变的政治环境下,能不能学好专业?他并无把握。而眼前的政治现实又使他不能不关心革命理论。当时有两本书对他影响很大,一本书是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另一本书是布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这些书使他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由此而继续学习,他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所吸引,逐渐地变成信仰,从此终生离不开它了。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孙叔平看到共产党挽救革命的“八一”南昌起义、叶、贺南征、广州起义,虽然未能取得理想的成功,但也看到了新的光明,仍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这使他由悲愤转而为愤激。他不顾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仍与同学结队上街游行,声援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不久,学校被包围、搜查,他的同学多人被捕、杀害,他也被大兵赶出了学校。轰轰烈烈的革命失败了,但是他相信中国革命仍会继续下去。他决定放弃学

籍，回到家乡参加党的地下工作。

1928年初，孙叔平回到萧县参加了党组织。从此，他开始了在徐州地区进行五年艰难的白区地下工作。1929年8月，孙叔平被派到睢宁县恢复党的组织，建立了睢宁特别支部，孙任书记。1930年4月，重建睢宁县委，孙叔平任县委书记。

1930年春，为执行立三路线，发动农民暴动，经江苏省委决定，成立徐（州）、海（州）、蚌（埠）特委。孙叔平由睢宁县委书记调特委任秘书。特委所辖包括苏、鲁、豫、皖二三十个县和两个煤矿。当时组织暴动的方针是：“秘密准备，突然袭击”。7月，红军占领长沙以后，说“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立即动手。徐海蚌各县大都发动了暴动，但很少成功。这种暴动可以说是胜利易，失败也易。而失败之后，上级领导则批评为“右倾”，要继续再干，再失败，直到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停止暴动的指示下达后，这种“左”倾暴动宣告终止。

1930年冬，江苏省委认为徐海蚌特委太大了没有必要，为了接近基层，分成徐州、海州、蚌埠三个特委。孙叔平在徐州特委工作。1931年春，孙叔平等同志请求取消徐州特委，建立铜山、宿县、宿迁三个中心县委，深入下去，进行工作，省委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孙叔平任铜山中心县委书记。在此后的一年里，孙叔平同党内许多同志一起，脚踏实地做了一些工作，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领导一些小规模的日常斗争，很有成绩，发展很快。

1932年春，王明提出“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又要发动暴动了。为了组织王明路线的暴动，1933年夏，又经江苏省委决定，合并铜山、宿县二个中心县委，成立新的徐州特委，孙叔平又到徐州特委参加领导工作。这次组织暴动的方法仍然是“秘密准备，突然袭击”。他们会提出怀疑，这不还是立三路线吗？答复是：这样的做法在1930年是错误的，在1932年就是对

的。这个“辩证法”一下子就把他们压倒。于是在 1932 年春末，在铜山组织了“周圩子暴动”，在睢宁组织了“曲头暴动”，在宿县组织了“古镜集暴动”，在萧县组织了“张庄寨暴动”。当时这些暴动和 1930 年组织的那些暴动很相似，即暴动成功很快，但失败也很快。这种暴动轻易地胜利、而又轻易地失败的惨痛教训，使孙叔平他们认定，组织这样的暴动是不对的，不能再这样干了。但是执行王明路线的省委领导，坚持认为发动这些暴动的做法是对的，失败的原因不是“左”倾，而是右倾，说他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给加上一项“富民路线”的帽子。此时，孙叔平深感新的王明路线比立三路线还“左”，但在他们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抵挡不住，还是跟着干，结果失败得更惨。

1932 年 11 月，徐州特委书记被捕，孙叔平代理特委书记。此时徐州地区的党组织，开始遭到严重破坏，直到 1933 年夏，发生了总的破坏，从特委到各县，所有的党团组织，几乎被破坏光了。

1933 年春，徐州特委和省委恢复了联系，由孙叔平到上海汇报情况。经省委决定，孙叔平即调上海，另指定三位同志负责徐州特委工作。孙回徐州，传达了省委决定，但因同省委联系中断，不能成行，只好留在徐州和新组成的特委一道工作。当时环境紧张，居无定处，那些叛变干了特务的人，积极协助警察进行搜捕。7 月，孙叔平不慎被捕入狱。

1935 年，孙叔平出狱后，目睹中国的现实，民族的危机，社会的黑暗，使他比之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有更深一层的忧虑，回到书斋里做学术研究的幻想被打破了。为了吃饭，他在丰县中学谋了一个中学教师的职业。这使他除了吃饭之外有能力购买英文本的马克思著作，使他能够继续不倦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了学习马恩原著，他又自学了法语，增强了阅读

各种文本书籍的能力,这也为后来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作了准备。在这所中学里,他团结了一些进步学生,不露声色,不多张扬地进行工作,启发青年向往革命,工作做得是很成功的。这些学生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多数成了游击队,建党、建政的骨干分子。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日本就在南边打进沪宁、蚌埠,北边打到台儿庄。在这民族存亡之际,孙叔平义无反顾地投笔从戎,和他的老同志、老同学一起,积极地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此时,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成立,台儿庄会战开始了。孙叔平他们在动员委员会的名义下,发动群众,讲抗日民主道理,也组织了若干武装,并在国民党散掉了的区乡建立了抗日政权,支援台儿庄会战,并准备一旦沦陷就地打游击。

1938年5月,徐州、萧县沦陷。当时局面十分混乱,除挂太阳旗的维持会外,土匪蜂起,以抗日名义抢掠拉票。还有地主的联庄会称霸一方。日军的烧杀淫掠,激起了民族仇恨,也在一部分人中造成了某种“恐日”情绪。这时,人民需要宣传,需要组织,需要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孙叔平和刚从监狱里出来、已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的同志一起,还新联系了一些有志于留在敌后打游击的同志,着手组织队伍。开始只有几支枪,就被土匪缴掉了。然后又七拼八凑组织了十来支枪,仍不敢独立活动。到枪支多到能独立了,才敢出来活动,揭起抗日游击队的旗帜。这样由小到大,终于建立了一支能够抗击日、伪军的武装力量。这支部队后由孙叔平等两同志带领,到陇海路北沛县同其它几支抗日武装部队会合,在党的领导下,正式成立了“抗日义勇队”,随后又打了一些胜仗。这支有数百人的部队纪律好,能宣传,也能打仗,他们的艰苦卓绝、英勇牺牲精神终于为人民所承认。冬天,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司令彭明治、政委吴法宪)到了沛县,这支部队又去会师,大部分编入八路军主力,一部分回萧县就地坚